

商人與國家：貴族會社、藏紅花行會與梅森行會

Dr Alexander Ressos, TEP

Attorney-at-Law (Switzerland), Solicitor (Hong Kong),

Solicitor (England & Wales)

1336 年的革命針對的是一個商人寡頭集團，然而商人們通過新的渠道保住了通向權力的途徑。在清洗中倖存下來的遠程貿易商人與騎士一起進入了 Constaffel。區域性商人，即出售香料、布匹、鐵器和小商品的店主，構成了 zur Saffran 行會的核心，而葡萄酒貿易則主導著 zur Meisen 行會。¹ 這三個團體成為蘇黎世商業精英的制度歸屬。它們與國家的關係，是將中世紀行會秩序與後來的金融中心聯繫起來的一條線索。

1 Saffran：店主行會

Saffran 行會在各行會的位次中居首。其成員最初是 *Krämer*，即出售進口商品的零售商人。行會的名稱本身取自最昂貴的香料（藏紅花），彰顯了其貿易的國際取向。² 其行會會所上的銘文將 1418 年的所有者描述為腰帶匠和商人的協會，這提醒人們 Saffran 行會也包括從事金屬和皮革飾品製作的手工業者。³ 作為遠程貿易與本地消費者之間天然的中間人，其成員是受城市市場規制、關稅和鑄幣影響最直接的群體。Saffran 行會十八世紀的資產負債表中有大量對農村社區的貸款，這表明此類行會的財富到那時已從貿易轉向了信貸。

2 Meisen：葡萄酒、客棧與明斯特廣場

Meisen 行會位居第二。其最初的成員是葡萄酒商、客棧老闆、馬具匠和畫師。在葡萄酒行業中，史料提到了斟酒人、葡萄酒叫賣人、葡萄酒搬運工以及經紀人。⁴葡萄酒與糧食、鹽和鐵一樣，是蘇黎世市場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之一，也是該市間接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。因此，控制葡萄酒分銷的行會在貿易與財政之間佔據著戰略位置。⁵位於明斯特廣場（Münsterhof）、於 1757 年落成的巴洛克式行會會所，顯示了該行會在十八世紀的財富與抱負。十九世紀，這裡設有該市的官方標準鐘，蘇黎世的鐘表均以此校準；戈特弗里德·凱勒（Gottfried Keller）也是其咖啡館的常客之一。二十世紀，這裡於 1946 年 9 月接待了溫斯頓·丘吉爾，並於 1980 年 4 月接待了伊麗莎白二世女王。

3 從手工業者統治到商人與食利者統治

商人與國家關係的長期趨勢是清楚的。對於近代早期，奧托·西格（Otto Sigg）已對其作了量化。在小議會中，手工業者在 1637 年佔成員的 40%，到 1790 年僅佔 6%，而食利者則從 36% 上升到 58%，商人從 20% 上升到 36%。在大議會中，同一時期手工業者的比例從 50% 下降到約 17%。在 1601 年至 1798 年間任職的 135 位國家首腦（*Standeshäupter*）中，只有十四位是手工業者，而八十五位是食利者，三十四位是商人。⁶《瑞士歷史辭典》（HLS）的結論是，布倫死後，從事貿易的手工業者和商人日益主導政治權力的實際行使。按照該辭典的敘述，對出口企業的壟斷服務於一個商人寡頭集團的團體利益。⁷

這一過程遠在 1519 年之前便已開始。1498 年賦予的自由選擇行會的權利，使商人和食利者得以進入手工業行會並代表它們。⁸由此，形式上賦予手工業一半權力的行會憲制，成了一個商業和資本所有者精英統治城市的工具。選舉實踐反映了這一點。行會選舉要

求宣誓選出最賢明、最優秀的人，但記錄顯示存在借宴席和禮物進行的賄賂，以及取消對手資格的種種手段。1582 年，新當選的行會會長貝亞特·希策爾（Beat Hirzel）因操縱選舉而被免職。1629 年 zur Waag 行會的一起選舉醜聞，使勒烏（Leu）家族的兩名成員喪失了被選舉資格，並使十一名普通成員被投入監獄，僅以麵包和水度日三天。⁹

這對商人與國家關係的影響是雙重的。一方面，蘇黎世的商人精英不需要單獨的政治組織來捍衛自身利益：他們本身就是政府。城市的關稅、道路和橋樑政策、鑄幣以及外交，都是由本身就是商人和食利者或與他們關係密切的人決定的。當商人們確實在 1662 年創立了一個單獨的機構——商人理事會（Kaufmännisches Direktorium）時，它是一個半官方組織，承擔了道路、橋樑和郵政服務等公共任務。¹⁰ 另一方面，商人是在一個團體框架內進行統治的，這一框架要求他們與行會會長分享職位，尋求所在行會的共識，每半年輪換職務，並向市民共同體重新宣誓。蘇黎世的商人精英固然強大，但他們以合議的方式行使權力，並且永遠不會完全忘記，他們的權威建立在行會之上。商業主導與團體約束的這種結合，塑造了日後現代金融中心得以成長的政治文化。

4 註釋

1. 《瑞士歷史辭典》（HLS），“Kaufleute”（Martin Illi），<https://hls-dhs-dss.ch/articles/016380/2016-03-23/>，關於區域性商人的組織情況：“in Zürich hauptsächlich in den Zünften zur Safran und zur Meisen”。
2. Otto Sigg， “Zunft Herrlichkeit”（1986 年），<https://www.zuerich-geschichte.info/pdfs/Zunft Herrlichkeit.pdf>； Monica Seidler-Hux， “Die Zürcher Zünfte”，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， 2024 年 4 月， <https://www.zb.uzh.ch/en/fokus/beitrag/die-zuercher-zunfte>。

3. Zunfthaus zur Saffran 的歷史標識牌，
<https://www.hmdb.org/m.asp?m=259179>。
4. Zunft zur Meisen，“Zunfthaus”，<https://www.meisen.ch/zunfthaus>；
Zunfthaus zur Meisen，“History”，<https://www.zunfthaus-zur-meisen.ch/en/zunfthaus-zur-meisen/history/>；關於葡萄酒行業，
參見 Wikipedia，“Brunsche Zunftverfassung”，https://de.wikipedia.org/wiki/Brunsche_Zunftverfassung，僅供參考。
5. HLS，“Ungeld”（Anne-Marie Dubler），2015年7月23日版，
<https://hls-dhs-dss.ch/de/articles/026199/>：Ungeld 是“eine Verbrauchs- und Umsatzsteuer auf Wein und anderen geistigen Getränken”，城市法將關稅和 Ungeld 一併列為“diese beiden wichtigsten Einnahmen des spätmittelalterlichen Stadthaushalts”。
HLS，“Zürich (Gemeinde)”，<https://hls-dhs-dss.ch/de/articles/000171/2015-01-25/>，將葡萄酒列為區域市場的商品之一。
6. Otto Sigg，“Zunft Herrlichkeit”（1986年），
<https://www.zuerich-geschichte.info/pdfs/Zunft Herrlichkeit.pdf>。
7. HLS，“Brun'sche Zunftrevolution”（Martin Illi），<https://hls-dhs-dss.ch/textes/d/D30735.php>；HLS，“Zürich (Gemeinde)”，“Wirtschaft”一節，<https://hls-dhs-dss.ch/de/articles/000171/2015-01-25/>。
8. HLS，“Villes corporatives”（Anne-Marie Dubler），<https://hls-dhs-dss.ch/textes/f/F9917.php>。
9. Otto Sigg，“Zunft Herrlichkeit”（1986年），
<https://www.zuerich-geschichte.info/pdfs/Zunft Herrlichkeit.pdf>。

10. HLS , “ Kaufleute” (Martin Illi) , <https://hls-dhs-dss.ch/articles/016380/2016-03-23/> 。

僅供一般參考。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，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，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。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狀況。

網上版本：hk.helveticaregister.com/zurich-merchants-and-the-state-the-constaffel-the-saffran-and-the-meisen